

美國現代政治家

(威廉·懷特)

今日世界社出版

美國現代政治家

威廉·懷德著
趙銘譯

THE RESPONSIBLES by William S. Whit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Copyright © 1972 by William Smith White.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July 1974

美國現代政治家

威廉·懷德著 趙銘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五二一七號

中菲文化出版社承印
菲律賓馬尼拉信箱一五一號

一九七四年七月初版

定價：港幣三元

封面設計：韓秉華

目 錄

第一卷	政治家畫像	一
第二卷	杜魯門	一七
第二卷	塔夫特	四
第四卷	艾森豪	六
第五卷	甘迺迪	一〇一
第六卷	詹森	一三三

第一卷 政治家畫像

在這種剛畢業或仍然在學的青年們以一兩本膚淺幼稚的著作，大放厥詞，而中年和老年們又復滿腹牢騷，唯物質利益是求的時代，幸有一點重要事實巍然獨存。雖有各種各樣的幻滅挫折，卑鄙齷齪，以及營私舞弊，和煽動慾惑的醜聞惡行，美利堅合衆國仍然時有一些不多見的恢弘堅毅，任勞任怨，真正負起責任的政治家，爲國宣勞。

如果只有全無知識的人纔會說美國的政治完美良好，有識之士大可以因一項重要事實而寬心。這就是就人論人，不求其十全十美，也不在追求不能達到的完美時摒棄差強人意的良善，我們最好的政治家比起任何政治舞台上的最好政治家來，並無遜色。

我們的制度及其運用中的缺點極其顯著；但是它的優點也所在皆是，却不被人廣聞周知。本書就是要闡述和讚揚美國政治上的負責政治家，那些對美國社會付出多過向社會支取的人們。他們當然全有瑕疵，全有錯誤。他們却也都終於確實證明了美國政治的基本活力，堅強，和良善。文中讚

美之詞並非發自完全天真的樂觀主義者（這種人早就沒有了），而是真心誠意的讚美，也是真心值得的讚美。尤其值得的是負責任的政治行為多數不僅在它自己的時代得不到獎勵，而且實際上常受懲罰，直到後來事過境遷，人們方有認識，得知真象。

首先，任勞任怨的負責政治家的首要品格是大勇；雖然這種大勇中通常也帶有真正恐懼之感，最少也有拖延的誘惑，拖到以後再說或再作必須作的事。負責的政治家是真正的英雄，但也是有理性的人，所以並不捨着作英雄。他們沒有壯烈成仁的必要。

他們具有堅定的決心，雖然這種決心並不排除希望能有別人站在前哨崗位上，能有另一個人先走過其責任和義務途徑上可能橫佈的危險布雷區。

每一個負責政治家雖然可能在某些情事中，在某些時刻，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但是究其終極，他們總有一種單純正直的平凡，以其內在的真正謙謹表現出來的常識。

他們也具有無可比擬的理解力，知道必須作什麼事，必須如何作，和不能作什麼事。這種理解力是英美政治優點的中心所在，實際上，它本身就是英美政治傳統對世界的最大貢獻。這是一個發自內心深處的對政治的真正意義和最高宗旨的必要認識。這就是使事物能有效能；但又不是十分完美，十分圓滑到使政府和人民不能作一點錯事；也不是敷衍顛預，使知情達理之士要推翻整個制度，另換一套那種確保每一班火車絕對準確，毫不誤點的制度。

這種品質，這種首先知道何者是必要的，繼之知道何者是可能的，第三知道何者是人民所能欣然接受的直覺，教育了，充實了，也鼓舞了負責的政治家。這種品質使他們能夠有所作為，能夠成

爲他們那樣的人物。這種品質使他們能在一個易於接受廉價推銷主義的政治氣氛中生存。

負責政治家所認識到而且遵行的一點，是政治活動的唯一鵠的雖然是成績和表現，却並不是說爲求達到目的就不惜採取任何手段。政治雖然遠非運動比賽所能比擬，却也不能被認爲血腥的鬥爭。它的目標當然是完成願望，但是你不能因爲要完成願望而完全把對方摧毀。你可以把他推開，甚至切切實實把它打倒，但是你得讓他能夠站起來，在情況許可的範圍內儘量保全他的尊嚴。因爲在偉大而廣闊的鬥爭中，今日的政敵可能是明日在一個新活動中極其需要的夥伴。

這一點或可稱之爲必要的禮貌律。它是必要的，因爲負責任的政治不足也不可能是割據砍殺的政治，一定要把對方殺死，並且把屍體放在祝捷的火堆上燒燬，以除後患。因爲不講禮貌不僅有虧道義，而且也有害自己，或者照現代的時髦術語說，是反生產的。

因此，每一個負責政治家的個性和行爲的根本基礎是接受有效政治行爲的規律和鐵一般的現實，那就是爲了人道和實際的理由，在鬥爭之後力行寬恕。許多美國從政者栽勦失敗，就在這個責任梯級的第一步上。

舉一個例：尼克遜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政客，直到歷經挫折之後方得成爲能負責任的政治家。其實他早在一九六八年以前就可以作到總統，但不幸他過去的表現顯示他未能瞭解美國的民族性，不瞭解他們在無意識中要求他們的領袖對敵方表現某種不可削減的寬恕，所以他未能成功。

到了一九六〇年，尼克遜確已掌握了這個妙訣。在他和甘迺迪的競選戰中，他力求遵行這項新的認識。但是，這個「新尼克遜」在當時太新了，選民還沒有充分瞭解他的轉變。即令如此，他僅

以此微之差，敗於甘迺迪之手。民主黨那次選舉勝利的真實和唯一重要原因何在，衆論紛紜，爭議不休。那也許是作爲甘迺迪的副總統競選人詹森在美國南部，尤其是在德克薩斯州的勢力的貢獻。

再推敲下去，有人相信關鍵所在，並不是詹森，而是競選運動中在達拉斯市一家旅館中對詹森和詹森夫人產生的一件事，一件偶然發生的小事，却改變了總統競選的結果。因爲右派分子譏罵推撞一位南國婦女的行爲，很可能倒轉了德克薩斯中很明顯的擁護尼克遜的傾向。這件事雖然可能被認爲並非決定成敗的關鍵，但是我們要證明的理論却無改變。而且據作者所知，詹森在此事發生時，立刻看到其可能影響，所以並不急急離開那個卑劣怨恨之場，直待攝影記者們照夠了像片，爲將來留下証據之後，方纔離開。甘迺迪自己有一次對我說，他認爲那件事是那一次競選中的重要大事之一。他微笑說道：「老詹的確不會急於跑出那個旅館。」無論如何，事實是那一次尼克遜差一點擊敗了甘迺迪。不管達拉斯市事件的重要性如何，重要的事實是在尼克遜的過去歷史中，有一點，而且只有一點，使他在一九六〇年未能當選爲美國總統。

這一點人們都還記得，雖然在細節上有點模糊，可是流傳極廣，舊尼克遜當權時，不僅是一個政治戰士，而且有時是一個遊擊戰士，缺少那種必不可少的直覺，知道不管敵方人數如何少，不可對敵方追擊過緊，過久，和過兇。

這就是說尼克遜所背負的「形像」久久不能脫身，其實那種「形像」早就確了。如果說他在一九六〇年那次失敗的競選運動中態度負責，那麼他在一九六八年那次成功的競選運動中態度就更加負責。關於越南戰爭的問題，尤其如此。在這一方面，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可能使在職的民

主黨總統詹森在探求某種勉強可以接受的方式，以謀解決越南問題的困難處境，更加困難。

這種知情達理的審慎態度，有兩個理由。一個理由是由尼克遜當時已經有了從事國家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克制。另一個理由是他確實較他的對手韓富瑞更能瞭解，不管大選結果如何，勝利者不管姓甚名誰，絕對不能在競選戰中貿然決定將來怎樣去應付北越當局和南越共黨。不管當選的總統終於決定採取何種途徑，這一點是重要的現實。尼克遜知道得很清楚。即令最後的決定是在越南認輸，（尼克遜當然從來未作此想，韓富瑞對此却似乎較欠堅定。）當選的總統絕對不能自陷絕境，或使世人認為他受他自己的競選言論的約束，不能脫身。

尼克遜早已擺脫了他過去的惡名聲。在一九六八年，特別是在他担任總統的最初幾年，在國內國際政壇上所採取的只能說是負責的態度裏，美國人民開始認識了這一點。他和本書所討論的其他已經功成名就，事業結束的人們不同，他的事業還沒有結束。他的未來和結局都還沒有展開，我們不能對他驟下斷語。

總之，尼克遜必須而且確曾從嘗試與錯誤，失敗與勝利的痛苦過程中找到本書所讚美的各位負責政治家的天賦才能，那就是一個自動啓閉的活門，他們無須檢閱這個活門，無須依賴儀器，就會自動告訴他們何時應該減少壓力。這個活門在甘迺迪，在艾森豪，在塔夫特參議員，在有很多深仇大恨的敵人的杜魯門，在有更多敵人的詹森諸人身上，很平靜地發生作用。在這些人，以及在過去和現在，在世和去世的其他負責政治家身上，這種活門告訴他們的不是應付局勢的陳舊辦法，而是遠較深刻和複雜的真正對策，它告訴他們美國社會在理論上和事實上是一個多元社會，在法律上是

一個聯邦合眾國，在人的方面和事實上是不同的人民和利益，種族和宗教，壓力和反壓力，肯定和否定，論戰和反駁的偉大結合。它使他們知道這樣的國家，這樣的人民，如果不能得到他們的同意，就不可能長期領導他們；一個以過高的代價得到勝利，手段過辣，言論從可以原諒的一時失言墮落到不能忘却和不能原諒的忿怒詬罵的領袖，也不會得到他們持久的支持。

尼克遜本人，後來回顧那些政治上嚴重分裂的年月，頗有悔意，雖然不一定完全正確，他的確是那種分裂的象徵。他做眾議員和參議員的時候，有時似乎認為和他意見相左的人，全都懷有惡意。他雖然實際上不完全如此，並不能改變許多人相信他確有此想的事實。必須經過八年的歲月，經過尼克遜在政治舞台上力表謙沖禮讓的八個年頭，方能獲得人民的諒解，方能入主白宮。

還有，甘迺迪的弟弟羅拔於一九六七年聲譽首次大降，當然是因為人民感覺他對詹森總統的鬥爭追擊太久，太不公平，人民深知政治鬥爭照例是激烈的，他們通常也喜歡看到一個有力量的大人物遭受打擊。但是他們不願意看到他遭受過久的痛擊，雖然他們對政客仍較對其他職業人士還為苛刻。

這種反應通常被稱為對弱者的同情，但並非如此簡單。因為人民感覺到負責的政治家所明確認識的，那就是在領導人與被領導人之間，不但必須有明顯可見的共同利害，而且也要有一定程度的超越物質利益的共同情感。

當然，負責的政治家自己有時會想報復他們在政治鬥爭中所受的真正或想像的傷害。但是他們隨後就會放棄這種思想，並不是因為他們是聖人，而是因為這種思想行不通。說得好一點，它不能

有助於他們的謀畧；說得壞一點，它對他們自己有害。

軍事理論在許多方面可以適用於負責的政治家，因為他們的職務都是領導，要有指揮的能力。在軍事行動中，最棘手和最困難的決定是何時進攻，何時撤退，何時應按兵不動，等待時機。使用軍力過多，和使用軍力過少，同樣可以造成嚴重的錯誤，對於指揮官的要求是要有在適當時間適當使用適當兵力的天才，以免因兵力不足的策畧而未奏大功，也免得因軍力過量的策畧而有浪費。

同樣重要的是要有眼光，能夠區分絕對必要的目標和只是過得去的目標。負責的政治家也是如此。他們是負責的政治家，因為他們知道目標各有不同。他們無需查閱參考文件，知道何時當用全力追求一項政治目標，也知道何時不去追求。他們的標準是：這個目標值得以重大代價奪取嗎？它真是一個全國性的目標，具有全國性的意義嗎？或只與一部分人或少數地區有關？簡言之，它是真正有關國家安全，榮譽或福利的目標嗎？或者它是一個在理想世界中當然應該解決，但若暫時擱置，亦非國家大患的問題？

對於這些重大的問題，在不同的時代當然會有不同的答案。杜魯門在內政方面的領導，以及對應該以他為首的政黨的領導，雖然始終並非真正有力，但是他是負責的政治家的一個極好實例。他在一九四五年羅斯福逝世繼任總統後不久提出的二十一點國內福利立法計劃，自提出計劃之日起到他離開白宮時，一直在國會中擱置。他受到美國國內億萬人的輕蔑嘲笑，却受到美國以外的億萬人的推崇；他們不管杜魯門在美國未能推行的政策，却極端崇敬他在世界各地的成就。

他離職後所留下的民主黨無可否認的是一團糟，不成為一個國內政治機體。他始終未能控制那

個政黨，甚至未能控制他自己的白宮僚屬。羅斯福時代強大顯赫的民主黨在杜魯門的領導下分崩離析，爭吵不休，在組織上脆弱無能，在行動上軟弱無力。至於白宮職員，有些人捲入了無關重要的弊端，有高級官員收受電氣冰箱和女秘書收受貂皮大衣的故事。

但從大事看來，這些事都無關緊要。因為杜魯門掌執大權的時期，美國，和美國的領導人，有一個無可躲避和空前未有的任務，這個任務並非擴大國內的福利工作，而是在一個稱爲「原子時代」的新時代中，控制並局限神秘莫測的冷戰危機。這個人出身於堪薩斯城黑暗的地方政治舞台，被投入自有政治權能以來政治家們所遭遇到的最危險、最複雜、和最難逆料的時代。他對他的二十一點或那個什麼民主黨，能夠有何作爲，或有何成績，並不重要。他對人類的無可言喻及無可衡測的危機能夠作些什麼，確實作了些什麼，却極關重要。

如果說那是一個前所未見的危險時代，也應該說那是一個輝煌卓越的時代，那個來自米蘇里州的「小人物」完全沒有做過所謂機密大事的任何經驗，也沒有從他的逝世長官羅斯福那裏獲得過任何重要指示。大家公認杜魯門是美國歷任總統中識見最差，眼界最狹小的政客。人們自始就認爲他深知地方政治的卑劣手段。因此也許可以靈活應付一個同樣出身的國會。但是對於世界大事，他定將束手無策。

這些推測如果就他的過去歷史來看，完全合理，可是有一件事情它未估計在內，所以它就站不住腳。這個事情是杜魯門雖然出身於堪薩斯城，却是一個真正負責任的政治家，正因為他是一個真正具有責任心的政治家，儘管他在表面上是一個庸庸碌碌的人，實際上却是一個極不平凡的人物。

所謂政治家只是過去的政客之說，並不一定正確。或者可稱為正確的一個人所以能夠成為偉大政治家，因為他不阿附流俗，反而作出卓越的表現，使政治家和他自己能夠超越陳規舊例。這樣說來，負責的政治家在他表現最好的時候是否就可以成為一個毫無瑕疵的完人？不是的。在他表現最好的時候，他也是一個可能有錯誤，有缺點的人。他只是在極端嚴重危難的時刻，有能力超越他本身和他的職位的常規，作出遠高於他的常態的表現，遠高於人民所能認識的表現。他的職位的一個缺點，事實上也可以說是他的命運，是他時常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表現得最好。做對了事，人們並不一定知道，往往並不知道。你的責任別人並不知道，甚至是隱蔽着的。徹底表現責任有時得不到別人的諒解，只能獨力以赴。

再以杜魯門為例。他在內政方面不斷遭受國會的打擊，在外交方面却在國會中次次勝利，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在蘇聯席捲巴爾幹諸國的情況下保全了地中海區，挽救西歐於崩潰混亂之中，並在蘇聯軍力威脅之下保衛西歐；在蘇聯包圍之下為盟國由於戰後安排而致孤立的柏林保持了一個立足點，建立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保衛網，那是他那個時代的最堅強，也是最巧妙的創造性政治家的行為；在代價雖然慘重，但手段極其高明的對韓戰進行的干預裏，首次毅然執行新的集體安全觀念；此外還有許多其他事件。

杜魯門以執拗的決心，在人們譏嘲和輕視之下，作了這些事，因為他知道如何在目標之間進行取捨，他瞭解各項目標的相對價值。而且在作這些事時，他在內政方面自行退讓，對反對他的人雖然也斷然反擊，可是從不過份，以免使他們在他知道必須不惜任何代價絕對不能讓步的那個領域裏

對他進行阻撓。那就是在國外必須保持美國的實力地位。

他不僅在內政方面自甘退讓；對他在當時的情況下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扶持領導的政黨也放下不管。他並且有心放棄他在一九五二年再行競選的機會，因為他急其所急，履行了他作為負責政治家應該履行的責任，而當時那些見解較差，但却能言善辯，圓滑周到的人們却勸他對國內的指責，稍加「屈從」。

杜魯門和所有負責政治家一樣，如果牽涉的問題，並不損害國家根本原則或利益，要他妥協，他也可以妥協。但是一牽涉到立國的基本，他決不對「政治」退讓。如果從事煽動在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不會構成重大的損害，他也可以從事煽動。如果他知道，職責所在，必須堅持，不管公眾的壓力有多大，不管爲了黨爭的關係，有多大需要，他也不曾從決定了的政策上退讓一步，不管什麼人，不管有多少人反對這個政策。（薩森在越南問題上就是如此。）

這就是負責任的政治家偉大之處，在支持本黨可對本黨有利而對國家利益無害時，他們支持本黨，並不後人。但正如他們知道何時適可而止，絕不過份攻擊對方一樣，他們也知道偏狹的政黨活動到了什麼時候就會變成不可容忍的黨爭。

因此，負責任的政治家的另一個特徵是問題一牽涉到人民的安樂，他們可以立即對公眾壓力低頭，但在問題重大，牽涉到國家安全或國家體制或傳統的完整，他們對公眾壓力就堅不退讓。

事實上，典型的政客爲求迎合衆意，隨時願意犧牲重要的原則或損折重要真理，這種作風，負責任的政治家，絕對沒有。在原則或真理上，他們極爲堅定，比專門職業者或工商界人士更能堅

持。

杜魯門堅持保留他的飽受詬責的國務卿艾契遜，雖然他知道如果犧牲了艾契遜，他在民意調查結果中的地位就會提高，他也可以獲得他自己民主黨中政客們的讚許。到底爲了什麼？並不是因爲杜魯門要裝英雄，充好漢，只是因爲他知道艾契遜爲人正直，才能出衆；而且更重要的，他知道如果因無知的批評而犧牲艾契遜，就會損辱杜魯門所任職務的體制，美國的總統體制。

此外還有越南戰爭的例子。對於越南戰爭的進行，美國主戰派認爲不滿意，因爲美國軍事行動所受的限制太多；美國土和派也不能支持這戰爭，因爲詹森總統不肯想辦法在不公開認輸的情況之下撤出越南。這位總統在內政方面總是力求符合衆意，但在外交事務上，却不肯接受委屈求全，以便退出越南的意見。

爲公務生活中扶植和培養真正必不可少的東西，也是負責任的政治家的一個特點，我記得俄亥俄州的塔夫特參議員，身抱癌症，仍在參議院中力疾從公，不稍放鬆他認爲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責任，那就是爲共和黨物色一個才德兼備的人，作該黨的參議院領袖，以保參議院的傳統。塔夫特一生謹慎，爲他的子女留下了豐富的遺產。他也終於選定加里佛尼亞州的諾蘭作共和黨參議院領袖，不是因爲他和諾蘭的意見相同，而是因爲他認爲諾蘭具有那種負責政治家在物色人才時所重視的穩重沉着和通達人情的條件。

在上文所說的範圍內，他們當然也是忠於自己所屬政黨的鬥士。但是他們絕對不仇視他人，只要力有所及，他們也不提拔性好仇視的人。再以軍事理論爲喻，最好的作戰部隊很少是那種咒罵敵

軍的軍人，而是那些深具作戰經驗，殺敵致果，從來不蔑視敵人的老將。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南軍統帥李將軍稱北軍爲「那些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名將蒙哥馬利元帥也稱德軍爲「那些小子」。

在政治方面，負責任的政治家也是如此。他們厭惡那些政治外行們的道德主義傾向。那些外行們認爲他們的政敵是壞得不堪的惡人，狂呼叫罵，要求他們自己的領袖不管時機是否適宜，但爲較作冷靜分析即知其並不重要的理由，上前衝殺一番。因此，使甘迺迪總統覺得好笑又好氣的是，他的政府中有些比較低級的人員，時常把完全正派、但是有點討厭的共和黨人，說成爲非作歹的傢伙。對於說他不斷吃南方民主黨人的虧，常被他們出賣的說法，他也覺得可笑。

這就是說，負責任的政治家厭惡一切形式的極端主義，認識到任何方式的極端主義是合理和有效政治的大敵。例如甘迺迪絕對不會欣然與桐激黨派如「民主行動委員會」攜手，不是因爲他認爲他們卑劣，而是認爲他們感情用事，愚蠢可笑。

桐激人士排斥負責任的政治家，因爲不管他們是左派或右派，總是抱有狂熱的信念，對於他們所認爲的好人過分愛護，對於他們所認爲的惡人過分敵視。負責任的政治家却認爲過分敵視與過分愛護同樣不智。他們深懼在政治上感情用事，因爲熾熱擁戴的狂焰可能在反對時也會過分激昂。爲了這種原因，初看時似覺奇怪，一般的負責政治家都不是十分高明的演說家。閱之動人或聽之悅耳的佳詞名句，多數出於代筆人之手，而非他們自己的作品，我所認識的偉大負責政治家中，差不多每一個人在說話或寫文章的時候，都很簡潔明瞭，並無文彩；都很乾脆，而非口如懸河。他們很少

是真正「飽學之士」。事實上，美國現代總統中最有學問的威爾遜從未到達負責政治家的高度；正如立國初期最有學問的傑佛遜在智慧和政績方面皆不如比較樸實寡言的麥迪遜。傑佛遜和威爾遜兩人皆言過其實。負責任的政治家知道他的任務很少是「使美國老鷹叫嘯」，却時常是遠較重要的是「使美國老鷹堅強而正確地振翼高飛」。

甘迺迪固然自有文采，但是詳細查閱他的文章，可以證明他的詞句多所改削，大體上務求平實，和多數負責政治家一樣，他竭力避免夸夸其談。

在佛森總統所作的一切文告中，最動人的章句見於他向國會發表的第一次專論公民權利的演說中，而其動人處就在質樸無華。事實上這一段動人的詞句是在事先準備好的演說稿讀完之後信口添上去的。

對負責任的政治家來說，「意見溝通」一詞的意義，與廣告業或多數其他職業對此詞的看法全不相同。它的作用不是通常那種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的意見交流。它時常只在表面上像是說明一個現有的局勢或問題或觀點；而實際上常是從現在看到將來，開始開動輿論，在探討現有的困難問題時，準備迎接領導人所預料將來可能發生的更困難的問題。他可能說的是一件事而想的是另一件事，因為負責任的政治家時常在表面上是一個解說人，而在骨子裏是一個預言家，一個巧為掩飾的預言家。掌握權力以後的審慎代替了競選時那種全無抑制的對於權力的追求。在追求與其後獲得崇高公職間的差別，是人生追求與獲得之間最大的差別。担任公職的人，一旦獲得公職之後，必須放棄追求時所用的手段，方能得稱為真正負責任的政治家。